

王蒙与中国当代文学

李 骞

内容提要 王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，作为个体的文学存在，他的作品涵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个历史阶段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审美内容，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，具备丰富而深刻的影响力。王蒙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，首先体现在他是文学史重点书写的对象，每一段文学史他都有标志性的作品。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标杆式作家，无论是表现题材、创作方法还是叙述技巧，他都与当代文学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他不仅用创作实践来证明自己与文学潮流的内在联系，还在理论上引导文学思潮的健康发展。王蒙素以风格多样化著称于文坛，其文体叙述的多元化大胆实验，主要源于作家深厚的文学底蕴，以及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的把控。做《人民文学》主编时期，他身体力行，兼容并包，培养了一批年轻有为、敢于在艺术上探索求真的作家，形成了当代文坛“百花齐放”的良好局面。

关键词 王蒙；当代文学；史识表达；文体探索

对于已经拥有 70 多年历史的中国当代文学，著名作家王蒙是一个巨大的存在，无论是文学史的撰写，还是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领域，王蒙都不能缺席，也不可能缺席。王蒙现象作为文学史的认知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，无论是“十七年文学”、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，还是“新世纪文学”，他的小说、评论都成为中国文化自信的样板。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的一面旗帜，王蒙的文学创作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变迁和演化的样本，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。本文将从当代文学史对王蒙所作书写的分析，王蒙对当代文学思潮的引领，王蒙小说对当代小说叙事文体转变的启示，以及他对年轻作家的关心、培养等几个层次，全面梳理王蒙与当代文学的关系，探察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不可或缺性，探讨他的小说创作何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的重要收获。

一 文学史中的王蒙

文学史是史学家对已有的文学资源开发、分析之后的史识表达，是编撰者写作思想、史学立场的

集中体现。文学史不仅要写文学思潮、文学现状进行客观的叙述，还要对作家作品进行史学的鉴定。有学者认为：“‘当代史’通常是指被视为最近过去的一段时间的历史，不论它是过去五十年的、十年的、一年的、一月的、一日的、还是过去一小时或一分钟的。”^[1]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上限时间是 1949 年 7 月 2 日至 17 日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（今北京）召开，以此为起点，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光辉历程。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部不断积累、不断创新、愈来愈丰富、愈来愈深刻的历史。70 多年来，从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于 1960 年 8 月集体编纂的《当代文学》至今，“中国当代文学史”或将“现代文学”与“当代文学”合在一起编写的“20 世纪中国文学史”，其著作数量之多，叹为观止。这些当代文学史无论是集体编著，还是个人撰写，王蒙都是重点描写的对象，这几乎是定论如铁的规律。

纵观几十来的“中国当代文学史”著作，个人独撰而影响比较大的有洪子诚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，陈晓明的《中国当代文学主潮》，孟繁华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通论》，孟繁华、程光炜的《中

国当代文学发展史》等。集体编著、并具有代表性的，有陈思和主编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》，王万森、吴义勤、房福贤主编的《中国当代文学 50 年》，张志忠主编的《中国当代文学 60 年》等。这些史学著作之所以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，是因为著述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追溯和总结有着与众不同的尺度，对文学史的判断和论述彰显了撰写者别具一格的史学观。特别说明的是，以上几部史学著作，对王蒙在当代文学史上的贡献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解读。集体合编的文学史虽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编的立场，但因为是多人的合著，对作家作品的解剖难免出现思想不能统一的遗憾。所以，本文侧重以个人或两人合著的“当代文学史”为案例，研讨王蒙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地位和影响。

洪子诚撰写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认为：“王蒙的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讲述的是关于 20 世纪现代中国社会的‘疏离者’的故事。”^[2]这个所谓的“疏离者”，是指小说中自信、热情的林震来到新的工作环境，遇到一位对工作不闻不问的上司，整个单位的气氛很沉闷，因不能融入其中而倍感困惑。这样的解释符合作家的创作理念，也是作品所要表达的主旨意涵。作为“外来者”的林震“到何处去”，就是王蒙给社会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，也是作家对人生哲学的思考。对于王蒙 20 世纪 70 年代末、80 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，洪子诚从作品的题材、启蒙的思想意义、艺术探索等方面作了较为完整的解读，认为王蒙的小说：“竭力要从混乱中寻找‘秩序’重建的可能，从负有责任者那里发现可以谅解之处，也会在被冤屈、受损害中看到弱点，和需要反省的‘劣根性’”^[3]。面对过往那段特定历史时期，王蒙的小说常常是从深沉的现实人生感受中，重新审视那一段社会，试图从人性的角度谅解制造“伤痕”的“负有责任者”，从而反思社会体制下普通人的人性弱点。此外，洪子诚对王蒙的长篇小说《活动变人形》也作了精辟的点评，剖析了主人公倪吾诚在东西文化背景下人生失败的原因。总之，洪子诚对王蒙的评价具有一定权威性，这种权威性是建立在对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的解读之上的。

陈晓明在《中国当代文学主潮》中，也把《组

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放在“双百方针”文学主潮下的“反官僚主义的文学”的范畴来讨论，他不仅详实地介绍了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，也概述了当年赞成派和反对派的观点，梳理了小说中的林震、王清泉、韩常新、刘世吾、赵慧文等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，并对每一个人物的意义作了颇为精准的分析。陈晓明认为书中的人物“就是一群知识分子”，作品所表现的就是“知识分子在革命年代里内心的茫然无措”^[4]。对于复出后的王蒙，陈晓明是这样总结的：“王蒙作为新时期最敏锐的一个作家，与历史总体性却总是有所偏离，这种偏离使他的作品具有更长久的历史反思性意义。他在意识流小说系列中，试图去揭示个人与自身的历史可能分离这样一个独特的主题。”^[5]在当代作家中，王蒙是一位以思想敏锐、作品主旨厚重透彻、艺术形式不断创新而领先文坛的杰出作家。陈晓明的评价，是基于对王蒙的小说文本熟读之后的透彻分析。由于王蒙是“最敏锐的作家”，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表达，具有深透的史学反思意义。他笔下的人物既在历史之中，又在历史之外，总是带着沉重的历史意识拷问历史，将历史元素与主流意识紧密结合。所以，他笔下的岳之峰、张思远、钟亦诚、倪吾成等人物形象都有着历史的厚重感。对王蒙的“季节四部曲”，陈晓明认为是“重温历史记忆”，是“补课和还愿”^[6]。总之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，真诚地还原历史、再现生活现实，依然是王蒙不变的审美情怀。

孟繁华、程光炜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》把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列入“干预生活”的文学思潮中的重点作品，从林震“他者”的眼光中剖析作品中的几类人物，而区委组织部暴露出的诸多的问题，让刚到单位的年轻的共产党员林震无法接受，更找不到存在感。“这些问题使一个年轻人的内心充满焦虑不安，但他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。这些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问题，从一个方面透露了社会已经出现的危机。”^[7]这部文学史从“他者”的视域，重估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的社会批判意义，提升了小说的主旨品格。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王蒙，《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》认为：“阅读王蒙的小说，人们发现两重视野成为他作品的基本

结构方式：一个是‘青春视野’，另一个是‘老干部视野’。两个视野的交叉渗透，构成像王蒙这样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代作家充满矛盾的创作世界。”^[8]这是从叙事策略的角度总结王蒙小说的结构模式，肯定王蒙的叙述文体在文学史上所起到的垂范作用。无论是“青春视野”，还是“老干部视野”，都拓展了当代小说表达领域的空间，对后来青年作家的创作有着引导的功效。

海外的两本史学著作《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》《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》也对王蒙的文学成就作了评介。对于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，海外学者认为，虽然是刻画惰性的，“但它是一篇更具匠心的作品。文章主线是一个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，相当隐晦，不是一眼能看穿的”^[9]。撰写者肯定作品对惰性的揭示，但却认为小说的主线索是“新来的年轻人”林震和赵慧文之间“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”。这个解释与国内众多学者的观点颇为不同，主要是从被遮蔽的情爱来诠释小说的主旨内涵，突出林震、赵慧文在工作中的相互理解和支持，与所在单位“组织部”索然无味的沉闷生活形成对比。很显然，这样的结论是从人的身心需求切入，根据小说暗藏的叙事副线来讨论主题意涵，虽然有一点偏离，却又不乏新颖。对王蒙20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，《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》是这样评价的：“王蒙主要关心的仍是做官的道德”，“由于他乐意进行技巧革新的试验，因而他的作品列在当前中国小说的前沿”^[10]。诚如所论，王蒙改革开放以来的小说，既注重技巧的革新，更强调官员的道德与信仰。《悠悠寸草心》《布礼》《春之声》《蝴蝶》等小说，都具有为国家、为人民“以身殉道”的理想精神。正是他小说中任重而道远的积极元素，和艺术形式上的不断革新，王蒙和他的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才“列在当前中国小说的前沿”。认为王蒙：“以谨慎检验文本接受度极限的一系列惊人作品，促进了有抱负的年轻作家的追求，从而在文坛留下深刻烙印。”^[11]这个烙印是深厚的，也是当代文学史上其他作家无可替代的。

到了新时代，当代文学史的撰写更为重要，对王蒙这样有卓越贡献的作家，更应该重点关注。王

蒙在每一个时段，都具有领文坛风向的标杆性小说，编写者必须植根于具体的作品，回到文学现场，才能更好地把握王蒙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。

二 文学思潮的“弄潮者”

文学思潮是文学史的记忆，由于每一次思潮的出现都有一定的社会潮流作为背景，因此，不管愿意与否，事实上任何一位作家都不太可能脱离当时的文学思潮而独立存在。文学思潮是文学繁荣的标志，文学史上的文学思潮都有其特定的创作理想和创作方法，作家只有融入当时的文学潮流，其作品才具有时代的当下性。王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杰出的作家，无论是表现题材、创作方法、叙述技巧，他都与当代文学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他不仅用创作实践来证明当代文学的存在，还在理论上指导文学思潮的健康发展。

“干预生活”是20世纪50年代最为显著的文学思潮，这个思潮的社会背景是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提出和贯彻。在“双百方针”的鼓励下，作家冲破了条条框框的束缚，特别是1956年《文艺报》在第3期刊登了《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》的文章，提出了“作家勇敢干预生活的精神”^[12]，反对口号式的“粉饰生活”，认为文学作品中“无冲突”不符合生活的客观存在。于是文学界出现了“百花齐放”的现象，很多作家都以文学创作实践参与了这次文学思潮，用热情洋溢的笔墨勇敢地“干预生活”。王蒙的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，从不同侧面触及现实生活中一些消极的东西，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、教条主义现象进行了揭示、批判和讽刺，这在当时和现在都是有积极意义的。几十年之后，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段文学史，便深刻地感受到在这一次文学思潮中，王蒙的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影响最为持久，是“干预生活”的上乘之作。据《文艺学习》披露，这篇作品发表后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“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在某些机关和学校，人们在饭桌上，在寝室里都纷纷交换着各种意见”^[13]。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汇报》《北京日报》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，《中

国青年报》和《文艺学习》还组织了对这篇小说的讨论，收到数以千计的稿件，许多名家都参与了讨论，热烈程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堪称空前绝后。从这个意上说，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对当代文坛的贡献已经超出了文学的价值范畴，从而具有社会学、政治学的深广意涵。“双百方针”引领下的“干预生活”的创作热潮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虽然时间很短，但史学地位特殊。特别是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，以其敏锐的洞察力，经典的叙事方式，厚重的思想意涵，凸显了这一文学思潮的时代意义。

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时期，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，先后出现了“伤痕文学”“反思文学”“改革文学”“寻根文学”“先锋小说”“新历史小说”“新写实小说”等重要文学思潮。复出后的王蒙，始终是文学的弄潮者，他早期的作品有意识地偏离“伤痕文学”的苦难叙事，注意剖析特定时代环境下人物的心理特征。也就是说，王蒙当时小说的叙事框架始终与揭露、控诉的书写方式保持一定的距离。1978年，王蒙的小说有《向春晖》《队长、书记、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》《最宝贵的》《光明》《难忘难记》。这些作品并没有脱离“伤痕”的具体历史形态，而是强调人的品格在特殊年代的自强意识，以及复出后的老干部对受伤害的年轻人心灵的启发和修正。相比控诉类的小说，王蒙的“伤痕”叙事，思想更鲜明，意义更深邃。王蒙理解心灵被伤害的一代人，他所要做的是纠正这一代人内心世界的“恶魔”，帮助他们重建信仰，割除心灵的“毒瘤”，清理他们灵魂深处的废墟，让他们从被伤害的心理阴霾中走出来，重拾丢失的信仰。在“伤痕”文学的书写大潮中，王蒙的小说彰显了拯救被损害者心灵的责任，从心理上给“伤痕”者动手术，增强他们“抗毒免疫”的能力。王蒙的小说，表层上避开了“伤痕文学”控诉苦难的悲剧叙事，但是作家力图从人性的话语中寻找救赎被伤害者的药方，从而构成了他改革开放初期小说的丰厚内涵。“反思文学”是“伤痕文学”基础上的理性发展，作为“伤痕文学”的升华，不仅仅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，而是将人性的思维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。如果

从文学历史学的角度讨论整个思潮，王蒙是“反思文学”中成就最大、影响更为广泛的作家。他的《悠悠寸草心》《布礼》《蝴蝶》《杂色》《相见时难》，都是“反思文学”乃至当代文学史上审美品质较高的精品。将个人的命运与政治学、社会学以及人民的生活现实结合起来拷问，这是王蒙式的反思。从小说的文本意义考察，王蒙的这种怀疑性反思，是当年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的文脉精神的再延续。当然，在新的文学语境下，王蒙反思的尖锐性又比当年更具有穿透力。《悠悠寸草心》的思考力度是建立在被解放的老干部是否还站在人民的立场，心中有没有人民的利益的层面展开。《布礼》回溯了历史的艰辛，展示了钟亦诚在20多年的悲惨遭遇中，意志坚定，始终不改初衷，内心深处总是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思考人生。《蝴蝶》的反思是通过人物内心独白的自我反省、自我否定，从而又自我肯定来完成。小说通过时间的交错，内心世界的转换，人物身份的多次叠加，反思和诠释了当权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。《杂色》将抒情与议论相结合，在人与马的对话中完成对历史、对人生、对社会的疑虑与反思。《杂色》中老马的两次开口说话，似乎是在用它的生存现状提醒曹千里，只有回到自然，回到人民群众之中，个人才会找到自己的价值。王蒙的“反思小说”用浓厚、立体的象征意蕴，反思了被压抑的个体生命只有融入大自然广阔的环境，在与人民朝夕相处的生活中，才会获得新的价值和意义。这就是王蒙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反思，这样的反思是人生经验在作品中的升华，具有社会性意义和价值。

“改革文学”是以文学的创作实践对政治上改革开放的回应，是小说与时代主潮同步的审美体现。王蒙对“改革文学”的贡献主要是在理论上的引导和支持，他的《谱写农村的新生活交响乐章》《漫谈改革题材文学》等文章，对这一思潮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，并要求作家：“要热情反映农村的现实、农村的变革，农村的新面貌，要充分肯定和赞扬现在党中央在农村实行的一系列政策，这些政策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。”^[14]针对一些对改革文学的负面评论，王蒙认为：“说改革题材作品不受群众欢迎是没有道理的。如一些反映改革

的电视剧，尽管不是十全十美，尽管文艺界对它有不同议论，但它在群众中掀起那样的热潮，反映了人们对改革事业的关注。”^[15]有了文学大家王蒙的强势介入，“改革文学”在当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“知青文学”是随着知青返城后逐渐形成的一个文学主潮，代表作家有史铁生、王安忆、张抗抗、张承志、梁晓声、叶辛、孔捷生等。对于年轻一辈的知青作家，王蒙给予了宽厚而客观公允的评价，先后发表过《王安忆的“这一站”与“下一站”》《读〈绿夜〉》《英勇悲壮的“知青”纪念碑——评〈今夜有暴风雪〉》等文章。在这些文章中，王蒙热情推荐了“知青”作家的作品，高度肯定了他们的探索精神。在王蒙看来，“知青”作家们“写的不是一己的悲欢离合，而是一代人的功勋和失误、欢乐和痛苦”^[16]。王蒙为年轻一代的“知青”作家鼓与呼，使他们的小说迅速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。1984年12月在杭州举办的“青年作家与评论家对话会”，被认为是“寻根文学”的开始。“寻根文学”就是回到本民族的文化源流，获得文学创作的新元素，以解救现代城市文化困境下人的精神价值的沦陷。对“寻根文学”，王蒙是理解和支持的，不仅对“寻根文学”的实力作家阿城的中篇小说《棋王》寄予很高的希望，还为这个思潮的代表作家李杭育的小说集《最后一个渔佬儿》写了序言，分析了李杭育的“葛川江系列”小说对于“文化寻根”的意义，助推了这一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。王蒙就是这样，以自己高境界的学养，关心和指导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。陈晓明认为：“先锋派并不是某一个特定时期出现的特定派别，它应该指可能发生在任何时期的、有创新精神，并且明显超越传统的文学群落或派别。”^[17]这样看来，王蒙在1979年发表的《夜的眼》等系列“意识流小说”，从创作手法、内涵意义上就是对同时期文学的超越，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开始的前奏。而他在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《一嚏千娇》就是带有后现代意味的文本叙事，作品叙事以议论为主，描述为辅，在很大程度上契合着“先锋文学”主潮的发展。对于“先锋文学”和之后的“新写实小说”，王蒙的《中国的先锋小说与新写实小说》《先锋文学失败了吗？》《先锋考——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

先锋》等文章，都对这两个文学主潮有过高屋建瓴的论述。对马原、孙甘露、余华、格非、洪峰等人的作品，王蒙都一一作了入木三分的评价，认为：“他们的作品侧重表达作者的内心感受，他们很讲究叙述的技巧与语言的奥妙、语义的含蓄与多层次性。”^[18]至于“新写实小说”，王蒙的“系列小说”《在伊犁》就是典型的纪实文本，小说中的人物、故事情节，在王蒙16年的新疆生活中都具有真实的原型。这种生活化的写实文体，对“新写实小说”思潮的产生，至少起到了孵化的作用。而且对王朔、池莉、苏童、李晓、叶兆言、刘恒、周梅森为代表的“新写实派小说”的作家及作品，王蒙从7个层面论证了这一流派作品中的“新”，全面阐述了“新写实小说”的审美功能。同时还对批评“先锋文学”“新写实文学”的评论家的观点进行有力的反批评。由此可以看出，王蒙对当代文坛新生力量的保护，对各种文学思潮的介入和指导，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，这不仅需要勇气和胆识，更需要远见卓识的大智慧。

三 文体叙事的探索、创新及其文坛的影响力

1979年是中国当代文学重要年份之一，当文学界还沉浸在“伤痕”“反思”的文学现象中时，王蒙这一年发表了《夜的眼》，这篇作品开启了中国当代小说现代主义叙事模式的转变，为中国当代小说叙事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之后，《春之声》《海的梦》《布礼》《蝴蝶》《杂色》等“意识流”小说相继发表。这些小说通过人物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的意识流向，在恍恍惚惚的感觉中完成人的存在价值的思考。这些被称为“集束手榴弹”的意识流小说引来了文学界的争议，一些人觉得读不懂，另外一些读者却又大加赞美。《夜的眼》发表后，文坛出现“争相传阅”的现象。由于是当代文学史上较早用现代“意识流”进行创作的小说，所以，一些读者难以适应这样的创作方法。有的读者之所以“看不甚懂”甚至“不知道主题是什么”^[19]，对小说表达的内容无法理解，是因为《夜的眼》的双重主题被主人公陈杲反复重叠的

心理意识所遮蔽。作品实际上是反思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所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，只不过这样的反思是用流动的诗意语言来完成的。

《人民文学》1980年第5期发表了王蒙的短篇小说《春之声》，作品通过一组跳动的、开放性的慢镜头，折射了岳之峰对人生、对生活、对社会的思虑。作家对人物形象在旅行中的见闻作了绝妙的艺术处理，通过内心的想象，展示了岳之峰的童年时代、故乡景色、经历生涯、国外风光。以岳之峰的旅行为经，用全面开花的描写技巧为纬，完成了小说深厚的主题意图，这正是《春之声》的艺术力量之所在。《蝴蝶》是“意识流”小说的典范，作品通过张思远内心世界的开放性描述，艺术地再现了一个有执着信仰又有诗情韵味的共产党人的心路历程。张思远对自我的认识——否定——再认识的过程，蕴含着作家对当代历史、当代社会、现实生活的思辨。韦勒克·沃伦认为：“只有文体学的方法才能界定一件文学作品的特质。”^[20]无论从当时的语境还是40年后重新定位这部中篇小说，在文体方法的创新方面，《蝴蝶》都是与众不同的作品，其影响力一定会穿越时空，成为文学史上的永恒话题。《海的梦》沿袭了《春之声》的叙事模块，缪可言的内心意识控制着小说的叙事进度，作品通过他的心理活动，巧妙地将其人生的重要片段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，反思一代人血与火的经历。面对大海，翻译家缪可言既感慨韶华易逝，过了“做梦的年纪”，又对来自自由的生活张开想象的翅膀。虽然是短篇，容量却格外丰厚。《杂色》也堪称“意识流”的精品，广阔无垠的沙漠和人格化的瘦马，是作品的写实线索，曹千里的意识幻觉是作品内涵的书写脉络，两条线索相互叠加，构成作品雄浑而厚实的社会内容。王蒙的这一组“意识流”小说，给当时的文坛带来较大的影响，没有沿袭当时已经贯穿当代文学多年的现实主义的方法论。有学者认为：“王蒙留给文学史的重要贡献也许是多种多样的，但他留给文学史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一定是在文体上的创新。”^[21]王蒙的“意识流”小说，开创了当代文学汲取现代主义方法文体写作的先河，推动了此后文学“百花齐放”的繁荣局面，对后来各流派的小说，特别是张辛欣、刘索拉、徐星等人的心理小

说，以及孙甘露、余华、格非、残雪、陈染、林白等人的“先锋”小说产生了较大影响。

王蒙是一位在艺术审美形式上具有多元化意识的杰出作家，他对艺术形式的成功实践总是令人耳目一新，目不暇接。除了“意识流”的审美技巧，寓言式的讽喻体也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贡献。作为一位大智慧的作家，作为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，当他把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融化到小说创作中时，一种智性的、讽喻性的文体便在文坛出现，并对当代文学的叙事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。这类文体在王蒙的小说中占的比重较大，都是对历史、对社会、对民俗民情的表现和总结。这些作品，具有一种温和而雅趣的幽默，虽然都是以较强的写实性来完成人物性格的塑造，但是语言调侃的含蓄性，情节的荒诞不经，常常让读者在忍俊不禁的笑声中，自觉接受文本的审美指向，钦佩作家世事洞明的深刻。《队长、书记、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》是最基层故事的表达，这是一篇接地气的优秀作品，作品用一种荒诞的现实来批评荒唐的形式主义作风，在幽默讽刺的文体背后，蕴藏着对荒诞历史事件与不正常的现实生活的批判力度。其它的如《风马牛小说二题》《冬天的话题》《来劲》对现实生活的幽默性嘲讽，《名医梁有志传奇》对现代生活的智慧调侃，《星球奇遇记》独树一帜的寓言式的讽喻叙述，《莫须有事件——荒唐的游戏》对王大壮处世态度的尖锐批评，《冬天的话题》通过“沐浴学问”的讨论、进而对朱慎独性格两面性的讥笑，《郑重的故事》关于文学“评奖”的嘲讽，等等。《蜘蛛》通过祝英哲的发迹史，对官场游戏与商场游戏的潜规则的批判，揭示了所谓“潜规则”对社会生态的危害性。这些作品从社会生活的某一个荒诞层面提取素材，通过形形色色的人性表演，表达了作家对后工业变革下现代人性的切齿之痛，其文本的讽喻体叙事已经达到艺术的顶峰，实现了全景式的立体放射状叙事。在当代文学史上，王蒙是较早实践讽喻体的作家，他小说的寓言式讽喻文体既具有开创性，又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使这一文体走向成熟。王蒙小说文体的创造性不但扩大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的叙述领域，对当代小说的多样化表现艺术，也起到了敢为人先的

引领作用。

谈到文体创新的贡献，王蒙的长篇小说叙事模式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更是可圈可点。《青春万岁》中“少共情结”积极向上的抒情，《活动变人形》对旧时代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历史困境下的记忆性叙事，《暗杀——3322》以宽厚而包容的幽默体表示思想转折的叙述，以及“季节四部曲”古今文化的杂糅，《青狐》叙述主体的开放性，《这边风景》对执着爱情、坚韧信念的原生态生活的再现，都凸显了他的长篇小说文体变革的轨迹。

1955年，21岁的王蒙完成了《青春万岁》的创作，这部以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高中生为题材的小说虽然时隔20多年才出版，但同样引起文坛的强势关注，有评论家认为它是“一部典型的青春叙事长篇小说”^[22]，而且是一部超越时代的弥漫着青春理想与朝气的优秀长篇。小说以1952年9月一群即将升入高三的中学生杨蔷云、郑波、袁新枝、吴长福、苏宁、呼玛丽等人的生活、理想，以及他们对人生、对社会的思考为描写基点，展示了建国初期的青年人人家国情怀的价值立场，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“青春体小说”的宏大叙事模式，对之后文坛以“青春/理想/信念”为主旨的小说创作，有着独特贡献。《活动变人形》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长篇小说，作家将描写的笔触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深层次领域，通过倪吾诚的人生悲剧，见证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。在文体上则是以诗意的自由和随意性见长，追求诗的精神特质，以一种笔力深厚的功力，驾驭小说的情节发展。作品不注重故事的关联性，没有人为的结构，更没有框定人物的情节，而是将倪吾诚、姜静宜、姜静珍、姜赵氏等不同人物在不同时空的生存现状，自然地穿插在诗意的叙述之中，表达人性的大美。这种蕴含深厚、矜持而诗意的文体叙事，拓宽了当代小说的审美风格。这种原创性的、跳跃性的诗性美叙事文体，从叙述的审美视角来说，对中国当代文学极具引领性价值意义。“季节四部曲”则是将时代符号化，由于作家把“革命/爱情”的结构指向，隐匿在意涵深厚的审美叙事内层，将时代信息隐藏在诗情画意的文体叙述之中，因而被文艺理论家王一川称为“拟骚体”。从文本的内容和

文体的表达形式而言，“季节四部曲”确实有将政治意识诉诸个人情怀的直抒胸臆，将人物的社会悲剧“移位为既有悲剧成分又有喜剧因素的政治悲喜剧”^[23]的成分，从而形成了大气派的、富丽铺排的新汉语文体。从文学史的意义上说，王蒙这种“骚体”今用的“半自传体”叙事，有着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创见性。《青狐》被学界称为“后季节”小说，这是因为《青狐》在解构历史叙事方面延续了“季节四部曲”的传统，小说采取了主线和副线两条结构相互交错的模块，叙述的主线以“青狐”即女主角卢倩姑的人生履历为描写的立足点，以重叠恣肆的笔法展开“青狐”大起大落的人生悲剧；副线则是钱文、东菊、米其南、王模楷、犁原、紫罗兰等来自“季节四部曲”的人物形象的延伸。两条结构线交叉重合，构筑了《青狐》夹叙夹议，妙趣横生的诗学境界。特别是叙事者直接出场的干预性评论，更是增添了小说“讲述”的审美功能。创作于1974年至1978年的长篇小说《这边风景》，以细腻真切的文笔，再现了作家“故国八千里，风云三十年”的生活现实。尤其是情节跌宕、故事曲折的章回体文风，以及人物富有斗争性的青春性格，使小说具有较强的可读性。《这边风景》中浓郁的现实主义表现技巧，再次彰显了王蒙小说文本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魅力。

王蒙的小说叙事文体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，无论是他此前的现实主义的“青春体”写作，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元化叙事，都是一种智慧的创意。就当代文学史而言，王蒙素以文体探索而著称于文坛。这种叙述多元化的大胆实验精神，来源于作家深厚的文学底蕴，以及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的把控。

四 《人民文学》王蒙主编时期

以长者的大度和智者的宽容，对年轻一代作家关爱与呵护，关心他们的成长，介绍和推荐他们的优秀作品，是王蒙对当代文学的又一重大贡献。当代文学之所以薪火相传，锦绣繁花，就在于有王蒙这样的文学大家对文坛的关注，对后起之秀无私地扶持。这主要体现在他担任《人民文学》主编时

曾力排众议，培养了一批年轻有为、敢于在艺术上探索求真的作家。王蒙于1983年第8期出任《人民文学》主编后，提出了突破名家圈子，“特别愿意推出文学新人”^[24]的办刊理念。在他的努力下，莫言、张炜、乌热尔图、李杭育、残雪、洪峰、李锐、阿城、迟子健、徐坤、邓刚、刘索拉、徐星等文学新锐，通过“国刊”平台登上文坛。他以大家的身份、用激情的思维、从自我创作的经验和感觉，来阅读当代文坛的新秀新作，力助他们的创作之路畅通无阻。他主编《人民文学》期间身体力行，兼容并包，引导了当代文坛多样化的文学潮流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，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拓宽刊物的办刊渠道，接纳新生力量，培植文学新人，贯穿王蒙主编《人民文学》时期。从1983年第8期开始，《人民文学》有了较大的变革，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一批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从“国刊”步入文坛。残雪是当代著名的先锋作家之一，她的作品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写作原则，追求艺术形式的新奇，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，描述瞬间的神秘梦境。这样的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很难被杂志刊载，但是，她的成名作《山上的小屋》却在《人民文学》1985年第8期推出，并引起文坛的热议，而这时候残雪的身份只是“个体户”。如果没有《人民文学》的慧眼初识，作为作家的残雪可能晚些时候才会出道。又比如1984年第10期发表的《蜜蜜姑娘》，作者刘岚是待业青年，1985年第11期发表的《小城热闹事》的作者小牛，只是在县城商业局工作的年轻的文学爱好者。这样的案例，在王蒙主编《人民文学》时期还有很多。其中最为特殊的是刘索拉的《你别无选择》，这是一篇有争议的中篇小说，但《人民文学》却在1985年第3期以头条的方式推出，这个中篇被誉为中国现代派小说的重要作品，是改革开放以来先锋文学的奠基之作。评论家李洁非认为：“像《你别无选择》这样的作品，确实给当时文坛造成了一种蜜月般的气氛，它象征着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的联姻，现实主义的大龄青年讨了一位现代派的老婆。”^[25]在李洁非看来，《你别无选择》之所以给文坛带来“蜜月”，是因为这篇小说从中国现实主义的主流文学

中脱颖而出，实现了中国先锋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。这足以说明《你别无选择》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文坛的震动，也正是有了王蒙这样敏锐而胆识超群的大家担任主编，刘索拉的《你别无选择》、残雪的《山上的小屋》、徐星的《无主题变奏》等先锋意识审美密度较厚的作品，才可能被“国刊”强势推广。1985年及其之后的当代文坛，一种宽松多元的文学繁荣局面，在王蒙主编的《人民文学》的引领下已然形成。继《你别无选择》之后，一批青年作家创作的具有探险性的作品陆续出场，如何立伟的《白色鸟》《花非花》《一夕三逝》、张承志的《九座宫殿》、韩少功的《爸爸爸》、徐星的《无主题变奏》、莫言的《爆炸》《红高粱》、刘西鸿的《你不可改变我》、高行健的《给我老爹买鱼竿》、马原的《喜马拉雅古歌》、余华的《十八岁出了远门》、洪峰的《生命之流》《湮没》等，这些作品在技巧上以暗喻、象征、联想、通感和知觉化为主，用人物的意识流动来揭示其内心世界的奥秘，具有审美艺术的独创性、不可重复性。《人民文学》有针对性地刊载这些探索意味浓烈的小说，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集体亮相，体现了主编的卓越见识。推出先锋文学的同时，《人民文学》坚守现实主义文学阵营，刊发了许多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文学作品，特别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革的小说，如张一弓的《挂匾》、何士光的《又是桃李花开时》《远行》、伍本芸的《宿愿》、杨东明的《消失的莲村》、林翔的《吐鲁番的葡萄》等。此外，王蒙主编时期，《人民文学》也非常重视报告文学，在他担任主编的1983年第8期至1986年，共发表了报告文学40多篇，其中蒋巍的《在大时代的弯弓上》，韩少华、李巍、韩怡冰的《晚霞》，理由的《香港心态录》还刊于头条。而刘心武的纪实小说《5·19长镜头》《公共汽车咏叹调》《王府万花筒》更是开创了当代纪实类文学的叙事空间，在读者层面和文学评论界都产生了较大影响。同时，老一辈的巴金、冰心、艾青、臧克家、丁玲等作家也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优秀力作。在王蒙主编倡导下，《人民文学》成为推动当文学思潮发展的重阵，老中青三代作家和平共处，各种艺术流派的作品共存共荣，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“百花齐放”的良好风貌。

王蒙主编时期的《人民文学》，拓宽了杂志的办刊空间，强化刊物与作者、读者的联系，实现了与作者的密切沟通，“更好地面对读者”“希望能够成为广大读者的知心朋友”^[26]的宗旨。其时的《人民文学》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“国刊”，而是青年作家成长的摇篮，各种文学思潮发表作品的阵地。为了更多地了解年轻作家的创作计划和创作现状，1985年，《人民文学》发起并组织了全国青年作家创作座谈会，莫言、马原、扎西达娃、何立伟、刘索拉、徐星等先锋作家都到会，并作了具有个性的发言。多年后，马原在文章中说：“在一九八五年的《人民文学》的这次研讨会上露面的这些新的作家，带动了我国文坛上一轮新的小说美学、小说方法论。”^[27]王蒙对先锋文学的提携不仅是在主编的刊物发表青年作家的作品，还在于他们的小说引起文坛争论后，以名家的身份撰写文章进行评介。王蒙以作家和主编的双重身份，身体力行，兼容并包，倡扬“百花齐放”的文风，这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，具有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。

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，“王蒙现象”内蕴丰富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与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的创作无愧于伟大的时代，他的小说、散文、文学评论，以及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，共同构成他维度丰赡的文学主体。因此，全面解读王蒙，别具意义和价值。

[1] 贝奈戴托·克罗齐著，道格拉斯·安斯利英译，傅任敢译，《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》，第1页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。

[2][3] 洪子诚：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（修订版），第128页，第264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。

[4][5][6][17] 陈晓明：《中国当代文学主潮》，第151页，第255页，第257页，第338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。

[7][8] 孟繁华、程光炜：《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》（修订版），第113页，第244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。

[9][10] R·麦克法夸尔、费正清编：《剑桥中华人民共和

国史》（下卷），第764页，第809页，俞金尧、孟庆龙、郑文鑫、张晓华等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2年版。

[11] 梅维恒主编：《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》（上卷），第841页，马小悟、张冶、刘文楠译，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。

[12] 参见《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》，《文艺报》1956年第3期。

[13] 参见《关于〈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〉的讨论》编者按，《文艺学习》1956年第12期。

[14] 王蒙：《谱写农村的新生活交响乐章》，《王蒙文集》第45卷，第41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。

[15] 王蒙：《漫谈改革题材文学》，《王蒙文集》第45卷，第150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。

[16] 王蒙：《英勇悲壮的“知青”纪念碑——评〈今夜有暴风雪〉》，《王蒙文集》第22卷，第71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。

[18] 王蒙：《中国的先锋小说与新写实小说》，《王蒙文集》第23卷，第300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。

[19] 宋炳辉、张毅编：《王蒙研究资料》（上），第27页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。

[20] 勒内·韦勒克、奥斯汀·沃伦：《文学理论》，第203页，刘象愚、邢培明、陈圣生、李哲明译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。

[21] 郭宝亮：《王蒙小说文体研究》，第8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。

[22] 王春林：《王蒙论》，第50页，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。

[23] 王一川：《汉语形象美学引论》，第181页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。

[24] 参见《编者的话》，《人民文学》1985年第3期。

[25] 李洁非：《1985年的狂喜》，《漂泊者手记》，第31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。

[26] 参见《不仅仅是为了文学——告读者》，《人民文学》1983年第8期。

[27] 马原：《小说密码：一位作家的文学课》，第341页，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。

[作者单位：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]

责任编辑：刘艳